

访谈录

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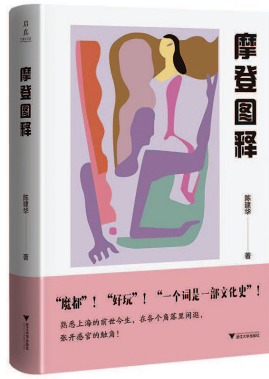
摩登上海的新旧之间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我是跟整个的上海的90年代错过了。”陈建华说起电视剧《繁花》里的时代金曲，没有那么感同身受。但是，这时候的他正在大洋彼岸穿越回《繁花》的前史之一，周瘦鹃的世界，鸳鸯蝴蝶派以及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大众媒介。再后来，2013年他回到上海，正逢小说《繁花》面世，里面引用了他半个世纪前文青年年代的诗句：“梦中的美景如昙花一现，随之于流水倏忽地消失，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

唯美的风格贯穿陈建华的书写，即便是论文也能读出未被规训的诗人之心。而他处理的人物之众——从朱熹、汤显祖到陈寅恪、茅盾、周瘦鹃、陆小曼、张爱玲，话题跨度之大——如书名所示：《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帝制末与世纪末》《古今与跨界》《文以载车》，诗文集《去年夏天在纽约》《乱世萨克斯风》《灵泉回响》《凌波微语》《午后的繁花》……都体现了杂食者的丰富自由。不久前他推出《摩登图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2024年又将有关论说文王国维的文集出版（商务印书馆，即出）。

陈建华先后获得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师从章培恒、李欧梵，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他回到复旦古籍所后，接棒导师创立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近日，《文汇报》采访了陈建华教授，请他谈谈现代文化的视觉面向及摩登上海的新旧之间。



玉有九德

■郭建光

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早阐释玉德的人应是春秋中期的管子，他将玉的品德归纳为仁、知、义、行、洁、勇、精、容、辞等九种。《管子·水地》的说法是：“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蹇，义也；廉而不判，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近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声清扬彻远，纯而不滑，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孔子也阐释过玉德，还说“君子比德于玉”。《礼记·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判，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诤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孔子的版本对比管子的，是都有仁、义、知（智）。所不同之处，从具体解释上看，则仍存在许多关联，如管子说“廉而不判，行也”，孔子将其修改为“义也”；管子将“叩之，其声清扬彻远，纯而不滑”定义为“辞”，而孔子将之定义为“乐”。

到了两汉时期又多了两个版本的“玉有五德”。西汉刘向《五经通义·礼》精简为仁、义、礼、智、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精简为仁、义、智、勇、洁。所有这些提炼总结出的玉德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通过赋予玉以德行化、拟人化的内涵，使谦谦君子的品德修养有了具体化、形象化的参照标准，对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文明素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今天，很多人仍然爱玉，但更多的是看重玉的外在之美和保值增值之用，往往不知何谓玉德，亦不知“君子比德于玉”、“守身如玉”一词，值得我们持续回味深思。

白宫里的疯男子

■ 编译/黎文

1926年，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 的沙发迎来了一位名叫威廉·C.布利特的美国外交官。这位年轻人觉得，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处理1919年《凡尔赛条约》时表现出的破坏性和非理性令人失望甚至迷惑。布利特相信总统如此反复无常，一定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布利特开始撰写这位总统的心理分析报告，看他的档案、采访他的身边人，继而确认总统患有弥赛亚情结，而他自大的错觉又使他无法处理现实。

历经两年合作后，1932年4月，布利特和弗洛伊德签下一部书稿。书直到1966年才出版，此时弗洛伊德已作古近三十年，布利特也在几个月后离世。出版的版本经过大量删节——此时，精神分析在大众文化中的神秘感已大大减弱，威尔逊总统的精神遗产则已无可撼动，弗洛伊德的后人甚至否认他参与了这个项目。

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部书的原稿一直不为公众所知。201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帕特里克·魏尔在耶鲁大学访问、浏览学校档案时偶然发现了这部原稿。魏尔细读之后重新评估了这部当年不受欢迎的心理传记，写成《白宫里的疯男子》（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警示人们一个“白宫狂人”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

不过，批评者认为，所谓威尔逊的行为源于早年与父亲关系紧张、心理受损的结论早就过时了，学术界目前更认可的解释是，威尔逊在巴黎谈判中的表现是出于外交需要，而在与参议院打交定时行为诡异则要归因于大面积中风的影响。此外，当年被删节的内容实属证据不足，子虚乌有，没有恢复的必要。批评者还认为，这书名实在大过标题党。威尔逊在两届总统任期内都相当合格，从来都不“疯”，书中所展现的威尔逊内心的紧张矛盾，也并不比其他公共人物更甚。



资讯

何改变及影响建筑及城市风貌。在分会“泰勒与城市、交通及城市规划”上，有人探讨了泰勒作品与建筑的关系。如音乐录影带中以房间颜色、物品及装饰体现情节交替，这种修辞手法与建筑学中的“建筑叙事”有很强的共鸣。而在更大的城市发展层面，泰勒的巡演被视为一场“大事件”，有研究者从城市社会学及地理学出发，认为其在培育社会团结、公众自豪感及志愿者服务方面都颇具影响。以墨尔本为例，泰勒的巡演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业、衍生娱乐活动及文化设施建设，墨尔本市民也对自己家乡能成为巡演城市之一感到骄傲，这类积极反馈足以媲美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世界级盛事。

泰勒吸引了身份背景各异的粉丝，她的身上自然有多元文化的构成。还有学者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泰勒是否可以被视为亚文化“新都市公共交通青年梗图”（以下简称“新都市青年”）的一员？与去年国内爆发的City Walk异曲同工，“新都市青年”作为欧美社交媒体上崛起的一股新势力，通过制作各种搞笑的梗图来推崇使用公共交通出行，从而减少碳排放。这位学者根据泰勒歌词中提及的交通工具的变化（从比较单一的汽车，到火车、巴士和步行），分析这些通勤方式在作品中出现的次数与意象，从而探究她与“新都市青年”所提倡的城市革命的关联。这或是对“低碳出行”的暗合，也印证了泰勒从美国乡村乐歌手到流行歌手的转变。

当然，泰勒在全球的人气也引来了不法分子，黑客们“各显神通”地试图利用“泰勒效应”牟利。在分会“信息安全与误导性信息”中，研究者分析了演唱会前、中、后三个阶段里不同程度及次数的网络攻击，发现在11个美国巡演城市中，总共共有12000多起发生在泰勒巡演期间的网络攻击事件——观众会收到关于酒店预订、航班取消等方面的钓鱼短信及邮件，其中还有5个城市发生了直接针对巡演的袭击。此类网络攻击在世界各地不停上演，大型活动举办期间的社会治安已引起多方关注。

（作者单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后现代的区别。

文汇报：您早年研究革命、研究茅盾，90年代才开始接触鸳鸯蝴蝶派，然后发现所谓旧派文人跟五四诸公，其实都是要奔向现代性，只是手段不同。您个人如何理解海派与海派文化呢？

陈建华：共和也好，革命也好，或者海派的摩登也好，它们作为关键词，都代表着某一方面。我在研究的时候比较强调我们有多把尺子，实际上这牵涉到现代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无论革命、通俗、摩登，都应该放到一个整体中去看。

现在的通俗文学研究，甚至新文学研究，都有很多新的面向。所谓新旧之间的边界有时候是流动的，不太清晰的。

周瘦鹃所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以及上海的大众媒介，相比新文学，更多受了英美文化的影响。这跟上海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础有关，是比较接近上海这样一个市民化、中产化的城市的文化。如何看待这些与革命宏大叙事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海派的海纳百川，可以说本身有一种讲求实际的文化取向。我希望我的书能打开一些新的窗口，让更多人看到其中的物质生活和城市景观层面，更倾向于情感的层面。现在对硬件方面已经说得很多，对于这些软件的方面，还有待深入。

现代性是由图像建构的

文汇报：关于“图释”，看图和看字的区别在哪里？

陈建华：文图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图像是一个更受制于视觉的感官，强调眼睛对思维的建构功

为什么是泰勒

■ 潘思芸

泰勒·斯威夫特是现代音乐产业的象征，也是千禧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化身。也许在平台化的时代里，真正的准社会关系已不是在泰勒与粉丝之间，而是在粉丝群体之中，存在一种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更富有责任、规训及情感共鸣的关系。

阶层攀升的过程中额外获得的免费粉丝劳动力、超额的资金投入以及更多被掩盖掉的付出。“我值得”代表了粉丝群中的供求不平衡，也代表了竞争。”卡洛强调，尽管粉丝劳动不一定是完全被剥削的免费劳动，但也正是这些“不求回报”的劳动铸造了泰勒今日的 success。当社会信息被平台无限碎片化的时代，公共人物和明星的公关往往依赖粉丝自发的付出。一如国内的明星后援会日渐制度化的运作模式，泰勒的粉丝群也采用更管理化的互动，规训群体中的“正确/应该”或“错误/不应该”的行为。也许在平台化的时代里，真正的准社会关系已不是在泰勒的粉丝之间，而是在粉丝群体之中，存在一种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更富有责任、规训及情感共鸣的关系。

哥特文化及女性文学形象

分会“文学深思及哥特”中，五位发言人从文学和音乐文本的角度分析了泰勒歌词中的哥特文化及女性文学

一个年轻的明星值得一场学术研讨会吗？

她的演唱会被测出2.3级地震，首演城市以她的名字命名，演唱会摄制成的电影上映也能大卖。她被称为“行走的GDP，分分钟可以造福一国经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公开“喊话”，希望她能把演唱会开到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泰勒·斯威夫特，这位1989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流行歌手，形成的“泰勒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超过了单纯流行歌手所带来的经济及文化影响。《时代》周刊称她实现了一种核聚变：“将艺术与商业结合在一起，释放出历史性的能量。”那么，为什么是泰勒？

2024年2月11至1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举行了一场泰勒·斯威夫特学术研讨会，来自全世界78所高校的130名学者，横跨60个学科分支，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具体而言，会上不仅有比较传统的明星文化和粉丝文化课题，更有交叉学科的有趣课题，如泰勒与哥特文化、与网络安全、与城市规划等。这些议题体现出泰勒作为流行文化符号对于世界的意义，而单一人物能让各个门类的研究者同聚一堂，也足见这个符号的丰富性。

平台化时代的准社会关系

《滚石》杂志资深撰稿人、纽约大学兼职讲师布兰特妮·斯巴诺斯在12日的开幕演讲中总结了泰勒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独特的女性敏感性、对音乐历史的追溯及对粉丝群体的重视。

尽管早年坊间一直对泰勒以真实恋情为创作素材争议不断，但如闺蜜私语的歌词却能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粉丝产生共鸣，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同时，泰勒对于美国乡村音乐发展的关心也使得她的作品拥有更多属于本土的质感和岁月的沉淀。斯巴诺斯认为：“泰勒是现代音乐产业的象征，也是千禧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化身。”2022年，她设计了一门关于泰勒的音乐之路的课程，在纽约大学一经公开便获得广泛关注。”正是在设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我发现泰勒的职业道路